



清代青花冰梅纹花瓶。

海南省博物馆藏

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，通常在阳历12月6日至8日交节，此时，太阳到达黄经255度。大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来临，气温急剧下降，降雪频繁，大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许多植物因无法适应寒冷而枯萎凋零。

然而，被我国先人誉为“岁寒三友”的松、竹、梅，却展现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：松树四季常青，其针叶细小且表面有一层蜡质，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，抵御寒冷和干旱；竹子的竹节坚韧，根系发达，能牢牢扎根于土壤中，即使被积雪覆盖，也能凭借自身的弹性挺直身躯；梅花则在寒冬中独自绽放，它的花瓣含有特殊的物质，能在低温下保持柔韧，不易冻伤。那么，在古人手中，工艺品或艺术品上的松、竹、梅，会是什么样的姿态呢？



清代方炳南《墨梅图》。海南省博物馆藏

松 万古长青傲骨基

松树作为坚韧不屈的象征，其文化意蕴源远流长。先秦典籍《论语·子罕》赞颂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首次赋予松以坚贞的道德品格。汉代儒学兴盛时期，松树更被广泛用以比喻君子持守节操、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，奠定了其“君子树”的崇高地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文人雅士寄情山水，松树以其孤傲挺拔之姿，成为隐逸高士风骨的代表，常见于诗歌吟咏与绘画描绘之中。宋元时期是松树纹样艺术表现的成熟期，文人画将松树的精神气韵推向高峰，使其成为山水画的灵魂，伴随着市民文化兴起，松树蕴含的长寿寓意日益凸显，常与鹤（松鹤延年）、鹿（松鹿同春）、灵芝等组合，表达世俗的美好祈愿。

明清两代，松树纹样迎来吉祥寓意的鼎盛与高度程式化，其象征君子之交与坚贞品性，在宫廷与民间工艺中无处不在，图案繁复精巧，如“蟠松”“团松”“不老松”“迎客松”，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、家族昌盛、江山永固的深切期盼。

竹 虚怀若谷君子风

竹子因其“中通外直”的物理特性，早在先秦时期即被赋予君子品格。《礼记·礼器》载：“其在人也，如竹箭之有筠也，如松柏之有心也。”将其与君子的内在美德相联系。魏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的典故，使竹子彻底成为隐逸高士超然物外精神境界的象征。

唐宋之际，竹子文化达到顶峰。白居易筑屋“十亩之宅，五亩之园，有竹千竿”；苏轼留下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千古名言；文同以“胸有成竹”开创湖州竹派新境界。

元代画家李衍穷尽毕生精力编纂《竹谱详录》，系统总结了竹子的画法技巧与精神内涵。

清代郑板桥则以独特的“乱石铺街体”题跋与其“瘦劲孤高”的墨竹相映成趣，将竹子的文人特质推向极致。

梅 凌寒独放冰雪心

梅花“香自苦寒来”的特性，使其成为最早被诗化的冬季花卉品种。从《诗经》中“擗有梅”的原始吟唱，经屈原《离骚》“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审美转化，至南北朝时期已形成完整的梅花象征体系。北宋林逋《山园小梅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咏梅名句，确

流光飞逝，大雪节气已至，哪怕是在地处热带的海南岛，也能感受到明显的冬寒之气。今天的年轻人，可能很少有知道“岁寒三友”的，它们是三种植物——松、竹、梅，却在文艺创作和器物纹饰领域，被赋以丰富的寓意和美好愿景：既有“阳春白雪”，也有“下里巴人”；既象征精神气节，又贴近民间气节。

由物及艺 大雪时节话“三友”

■ 方波



清代绿釉开光红竹纹瓷碗。海南省博物馆藏



清代仿成化斗彩松竹梅纹瓷瓶。海南省博物馆藏

立了梅花清幽孤高的审美标准。

明代王冕的《墨梅图》以浓淡相间的墨色表现梅花，开创“不要人夸颜色好”的写意传统。

及至清代，梅花主题纹饰进一步普及和图案化，宫廷御用瓷器（粉彩、珐琅彩）上的梅花纹样精细华丽；民间则更爱用“喜上眉梢”“五福捧寿（梅花环绕寿字）”等主题装饰，梅花与冰裂纹组合则象征“冰清玉洁”，完美融合了士大夫崇尚的精神风骨与普罗大众向往的生活福祉，其凌寒绽放、暗香浮动的形象，已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象征。

合 “岁寒三友”寓意深

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松、竹、梅以“岁寒三友”的象征组合源于南宋时期，林景熙在《王云梅舍记》中记载：“即其居累土为山，种梅百本，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。”

松树以四季常青、凌冬不凋的特性象征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与刚正不阿的操守，其扎根岩隙、枝干擎雪的形象被赋予“不屈不挠、坚守自我”的精神内核。

竹子则以空心有节、经冬犹翠的特质承载虚怀若谷的谦逊与节节高升的进取，其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及凌云处尚虚心”的成长特征成为士大夫“正直有节”君子品格的象征载体，竹节结构更被引申为道德约束的隐喻。

梅花凭借“凌寒独自开”，象征着高洁坚贞。陆游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中的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，展现了梅花高洁的品格及乐观向上的精神。

松竹梅纹饰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实物与文献中均有明确印证，其演变过程可分为四个关键阶段：宋代为其纹饰主题的萌芽期，南宋黄昇墓（1975年出土）与德安周氏墓（1988年发掘）出土的松竹梅纹均以平纹为地、纬浮显花的织造工艺，证实了“岁寒三友”组合最早以折枝式构图应用于丝织品，其淡雅含蓄的暗花效果体现了文人审美对工艺美术的初期渗透。

元代实现载体突破与风格定型，青花瓷技术的成熟使松竹梅纹样成为釉下彩核心主题，元青花呈现两种典型风格——大件器物的写实风格（如折扇形松针、单笔勾勒竹叶）与小件器物的写意风格（高足杯等），其构图取法源于赵孟坚《岁寒三友图》的枝干交错风格。

明代形成了官窑规范与世俗化分流，延续了元代风格但构图趋简：永乐青花强化雪雾质感，成化时期与洞石栏杆组合成庭院景致，晚明因道教影响出现松枝扭曲成“寿”字的变形纹样，并融入仙鹤等辅助纹饰。

清代延续并强化松竹梅主题纹样内涵，在装饰风格上，追求写实效果：松树松干虬曲斑驳，常刻画树洞细节，松针以数朵成簇的针状或团状呈现；竹叶修长挺拔，叶脉精细描绘；梅花则分水点蕊，疏密有致，衍生出“冰梅纹”雏形（花瓣外渲染、圈内留白）。在工艺表现上，青花发色浓艳，粉彩色调柔和高雅，釉里红工艺精湛，红白对比鲜明，纹饰立体感强。清代“岁寒三友”主题纹饰构图趋于繁复密集，常与辅助纹饰（如兰、石、芭蕉）组成“五清图”等延伸主题，体现多元寓意，融合文人精神与宫廷审美。在器物功能上，除器表装饰外更强调其政治与道德教化，如乾隆以松竹梅主题装饰其御书房“三希堂”，将“岁寒三友”主题升华至修养境界的深度。

“岁寒三友”的精神品格与大雪的高洁品质深度契合。大雪时令，天寒地冻，万物敛藏，松树傲雪挺立，针叶长青，展露不屈风骨；翠竹根深节劲，雪压不折，彰显刚毅之姿；梅花凌寒独放，暗香浮动，预报春之先声。三者皆在严寒中勃发生机，以坚韧、高洁与希望对抗自然严酷，在严寒中见精神，在寂寥里觅生机，彰显着中华民族崇尚逆境坚守、内在刚强与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）

临高明代“拔萃”牌坊 走过沧桑五百载

■ 符能

任职的记录，可能是民间的传说和现实有所偏离。

罗公著去世后，后人将他葬在博厚和盛村一带，并修建了石牌坊。我们在博厚镇寻找“拔萃”坊的时候，得到多个村庄的群众帮助，最终在和盛村外的稻田边一个山坡上找到它。

“拔萃”坊为一间两柱式，宽3.3米，高

2.9米，旁边有一棵十分茂密的大树，显得特别有灵气。坊额楷书“拔萃”，看起来十分古朴，历经了500多年仍然清晰如故。

“拔萃”出自成语“出类拔萃”，有牌坊主人在科考中在当地十分优秀之意，这也是目前所知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一座“拔萃”牌坊。

“拔萃”坊上没有文字说明牌坊修建年代



临高县博厚镇的明代“拔萃”牌坊。符能摄

等信息。由于牌坊所立的地方离洋孝村有5公里多的距离，且在墓的附近，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明代墓坊。“拔萃”牌坊旁边有一块“步云”石碑匾，可能是当时给罗公著立的另一座石牌坊的遗存。

罗公著的坟墓曾被破坏，后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在原墓址不远处重修，碑文有“明化上祖乡甲拔萃罗二公墓”及其生平。

每年的清明节期间，博厚镇的罗公著后人会到其墓前祭祀，并清理和描红“拔萃”坊。

据了解，海南现存的明代牌坊不多，其中临高现存两座明代举人的牌坊，其一是纪念王佐中举的功名坊“礼魁”坊，得到了及时的修缮和保护，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；“拔萃”坊由于年久失修，坊身稍有倾斜，周围遍布杂草，与海南其他同一时期所立的举人牌坊相比，显得特别沧桑。2013年1月，临高县人民政府给“拔萃”牌坊立了“临高县不可移动文物点”的石碑。

漫话古代“快递”

■ 周铁钧

《孟子·公孙丑》记载：“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”其中“邮”特指传送公文或物品的人员或机构，表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已有了类似如今的“快递”业务。当时齐国、郑国把“邮”称“遽”，晋国、楚国叫“驛”，鲁国、吴国叫“传”，“邮”的通道称“驿路”，人员称“驿使”或“驿卒”，途中休息、补给的地方称“驿站”。

《周礼·秋官》记有：“行夫使、司驿，督时必达。”《周礼·地官》中也说：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。”意思是：朝廷设有“行夫使”的官职，专门管理、监督“快递”准时送达。驿路每隔10里或30里就有可供餐饮、住宿的驿站。

秦汉时期，为防“快递”公文泄密，要用胶泥封住开口，加盖印迹，“快递”物品要据其形状装入密封的皮囊，同时还实行严格的收发、交接制度，确保安全运送、准时到达。

到了唐代，“快递”体系和规模空前发展，《唐六典》记录：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国都长安（今西安）有通往沿海各州、府的驿路25条，驿站1290多个，驿使（卒）1.3万余名。驿路隔50里设一站，快马1个时辰（2小时）抵达下一驿站换乘马匹，一昼夜可连续行进600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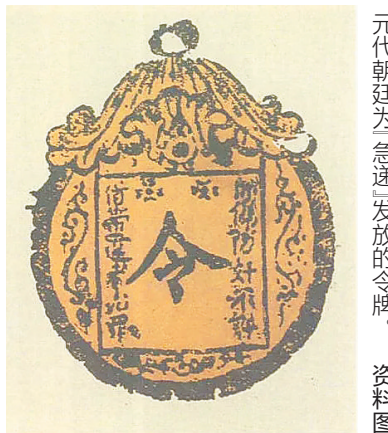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记述：“快递”分步递、马递和急脚递三种，宋神宗登基后，又增设了金牌急递：“快递员”身背金色木牌，上书“御前文字，不得入铺”，表明是紧急传递圣旨或皇上御批的文件，到了驿站递件不能入内，要立即换马或换人接续赶路。

古代“快递”不但传达、运送御旨、公文和物品，在传送军事情报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《资治通鉴·宋纪三》记载：430年，北魏元师吐谷浑统领2万铁骑，从幽州（北京）起程讨伐宋国领地济南郡。当时，宋国在幽州到济南路途上设有内装成酒楼、客栈、茶馆的30多个驿站，魏兵刚出发，宋国驿卒即刻“快递”情报，仅2天就送到了济南郡，郡守萧承之马上传令撤离城内百姓，在城外埋伏重兵。魏兵进城4天才到了济南城，却见城内空无一人，吐谷浑正在大感，城外喊杀突起，万余宋军把魏兵困在城中，不到3天，城内粮草断尽，吐谷浑只得率众受降。这是宋代首个得益于“快递”大获全胜的战例。

随着驿路的畅顺通达、设施健全、人员齐备，帝王和权贵开始“快递”私货，如唐玄宗为杨贵妃从岭南（一说西南）向长安送荔枝；唐肃宗从江浙沿海向西安运鲟鱼；山东巡抚向朝廷进贡海鲜等。

也有官府靠权势在驿路上走私，商人们也开始买通管理驿站的官员，传送私人物资、贩运商品。《永乐大典》记有元代天历三年（1330年）的“驿站”现状：“今各衙门官员为营私事，不肯遵守法度，搬取家属，收给子粒，迁葬娶妻，送夫嫁女，泛滥给驿，以致‘驿站’消乏。”

明清时期，不但陆地驿路四通八达，还开辟了京杭大运河等多条“水驿”通道，许多地方成立了专门“快递”信函、物资的“民信局”和保护贵重物品的“镖局”，“快递”是交通运输、信息传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元代朝廷为“急递”发放的令牌。资料图